

從網路輿情看臺灣低婚率問題：2023-2025 年 KEYPO 大數據分析

徐家翔*

摘要

近年臺灣少子化、高齡化與青年成家困難持續受到關注，其中低婚率逐漸成為理解人口危機的重要前端議題。本文採取人口社會學與網路輿情分析之整合研究途徑，以作者提供之 2023 年至 2025 年 KEYPO 婚姻輿情資料為基礎，並結合內政部戶政司結婚登記統計，分析低婚率議題在網路公共討論中的聲量變化、情緒傾向與論述結構。研究發現，臺灣結婚對數由 2023 年的 125,192 對下降至 2025 年的 104,376 對，粗結婚率亦由 5.36‰降至 4.47‰；同期間婚姻輿情維持高聲量，2025 年負面聲量達 115,324 筆，占 58.34%，顯示網路討論中對婚姻的焦慮、不信任與風險感知升高。本文指出，低婚率並非單純來自個人主義或年輕人不願結婚，而是經濟壓力、居住負擔、性別角色變遷、婚姻風險感知與生活價值轉型共同作用的結果。政策上，政府不宜僅以生育津貼或結婚補助回應人口危機，而應從青年成家條件、可負擔住宅、薪資穩定、照顧支持與性別平等治理等面向進行整體改革。

關鍵詞：低婚率、晚婚、不婚、KEYPO 大數據、網路輿情

* 中國文化大學國家發展與中國大陸研究所博士生，Email: johnseen76@gmail.com
本論文經兩位雙向匿名審查通過。收件：2026/6/20。同意刊登：2026/7/20。

壹、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臺灣人口結構近年快速變遷，少子化與高齡化已成為政府、媒體與社會大眾高度關注的公共議題。然而，既有討論多半集中於生育率下降、育兒成本、托育政策與生育補助，較少進一步追問：為何越來越多年輕人尚未進入婚姻？若婚姻本身逐漸被視為高成本、高風險與低誘因的生活選擇，則少子化便不能只被理解為「不生」或「不敢生」，而應放回婚姻形成條件的變遷中加以分析。

根據內政部戶政司結婚登記資料，2023 年結婚對數為 125,192 對，粗結婚率為 5.36‰；2024 年結婚對數為 123,061 對，粗結婚率約 5.30‰；2025 年結婚對數則下降至 104,376 對，粗結婚率為 4.47‰（內政部戶政司，2026a）。此一趨勢說明，低婚率不只是價值觀變遷的結果，更與人口政策、青年政策、住宅政策、勞動條件與家庭政策密切相關。

若進一步觀察適婚年齡人口結構，本文以 25 至 44 歲作為主要婚姻形成年齡帶進行補充說明。依內政部戶政司「現住人口數按性別、年齡、婚姻狀況及婚姻類型分」資料，114 年底臺灣 25 至 44 歲人口約 655.84 萬人，占總人口約 28.15%；其中未婚人口約 351.64 萬人，占 25 至 44 歲人口約 53.62%。此一數據顯示，低婚率並非只呈現在年度結婚對數下降，也表現在適婚年齡人口中未婚者比重偏高，因而有必要將官方人口統計與網路輿情中的「不婚」、「晚婚」、「不敢結婚」論述放在同一分析框架中理解（內政部戶政司，2026b）。

從網路輿情觀察，近年「不婚不生」、「晚婚」、「不想結婚」、「不敢結婚」、「結婚率下降」等詞彙頻繁出現在新聞留言、社群平台、論壇與短影音討論之中。這些討論並不只是私人情感經驗的表達，更反映青年世代對婚姻制度、經濟條件、性別分工與人生規劃的重新評估。

本文的研究動機在於，現有少子化討論多從生育率下降與育兒政策出發，卻較少將低婚率視為人口危機之前端機制。若婚姻形成本身已經弱化，則後續生育行為自然難以單靠補助政策改善。因此，本文嘗試將官方人口統計與網路輿情資料並置，一方面觀察婚姻行為在統計上的下降趨勢，另一方面分析社會大眾如何在數位公共場域中理解、歸因與問題化低婚率。

本文的問題意識在於：臺灣低婚率並非單純由年輕人不願負責、個人主義興起或婚姻價值衰退所造成，而是青年在面對高房價、低薪資、生活成本上升、家務與育兒責任不均、親密關係風險與自我實現價值提升時，對婚姻制度所做出的重新評估。本文嘗試透過 KEYPO 網路輿情資料，觀察低婚率如何在數位公共場域中被討論、被歸因與被問題化，並分析其對臺灣少子化治理與青年成家政策的啟示。

基於上述問題意識，本文提出四項研究問題：第一，2023 年至 2025 年間，臺灣婚姻輿情的整體聲量與情緒傾向如何變化？第二，網路輿情如何理解臺灣低婚率的主要成因？第三，低婚率議題中的「不婚」、「晚婚」與「不婚不生」如何呈現青年世代對婚姻制度的重新評估？第四，低婚率作為少子化前端問題，對臺灣人口政策、青年成家政策與性別平等政策有何啟示？

貳、研究途徑、方法、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途徑

本文採取「人口社會學與網路輿情分析之整合研究途徑」，並結合文獻分析法、官方統計資料分析法與網路輿情觀察法。透過文獻分析法整理第二次人口轉型理論、生命歷程理論、性別平等觀點及臺灣低婚率相關研究，建立本文的理論基礎。並運用內政部戶政司結婚登記、年齡結構與婚姻狀況資料，說明臺灣婚姻形成的客觀趨勢。最後透過 KEYPO 網路輿情資料進行觀察，分析低婚率議題在新聞、社群、論壇與短影音平台中的聲量變化、情緒傾向與論述結構。

此一研究途徑的特色在於，本文不僅分析官方統計上的結婚率下降，也進一步觀察社會大眾如何在網路平台上理解婚姻、討論不婚、解釋晚婚，並將這些討論連結至經濟壓力、居住負擔、性別分工與生活價值轉型。為避免人口統計與網路輿情僅形成並列關係，本文將兩類資料放入「客觀婚姻形成下降—主觀婚姻風險感知上升—政策回應不足」的共同框架中檢視：官方統計呈現結婚對數、粗結婚率與適婚年齡未婚人口比重，網路輿情則呈現社會如何解釋這些下降趨勢，以及哪些風險因素最容易被公共討論放大。

二、資料來源與研究範圍

本文以作者提供之《KEYPO 大數據關鍵引擎》2023 年至 2025 年婚姻輿情資料為主要分析基礎，並搭配內政部戶政司結婚登記統計作為現實人口資料對照。研究時間範圍分別

為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KEYPO 資料來源涵蓋新聞網站、社群平台、論壇與部落格等，包括 Yahoo!新聞、BBC News、Line Today、經濟日報，以及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Threads、TikTok 等平台。本文分析重點包括三個面向：第一，整體聲量變化，觀察 2023 年至 2025 年間婚姻輿情總聲量與重要討論高峰；第二，情緒傾向變化，比較正面、中立與負面聲量比例；第三，熱門關鍵字與議題結構，分析「結婚率、晚婚、不婚、不婚不生、高房價、生活成本、性別角色」等詞彙如何共同構成低婚率論述。

本文所稱 KEYPO 資料，係指作者自《KEYPO 大數據關鍵引擎》匯出並整理之研究資料，非正式出版文獻，故不列入參考文獻，僅於研究方法、表格註記與本文敘述中說明其資料來源。

三、關鍵字設定與資料處理

本文 KEYPO 查詢以「婚姻輿情」為主題資料，並以「結婚率、晚婚、不婚、不婚不生、不想結婚、不敢結婚、低婚率」等詞彙作為分析核心。此一設定目的在於同時捕捉制度性語彙、生活經驗語彙與網路社群常用語，避免僅以「低婚率」一詞搜尋而忽略「不婚不生」、「不敢結婚」等實際討論中更常見的表述。

資料處理上，本文將 KEYPO 年度總聲量、情緒比例與熱門關鍵字視為全年度趨勢資料；另將作者提供之 Excel 前 500 筆資料視為高互動或代表性樣本，僅用於觀察平台分布、標題語彙與代表性討論，不推論為全量平台比例。情緒資料主要採 KEYPO 系統分類結果，本文僅進行趨勢詮釋，不將其視為精確心理測量。

本研究採取主題資料與相關關鍵字交叉觀察，目的在於掌握低婚率相關網路論述趨勢，而非估計單一關鍵字之精確出現率。因此，本文分析結果主要作為議題趨勢、情緒方向與論述結構之詮釋依據。由於本文使用者端取得之 KEYPO 資料係以系統主題與關鍵字查詢結果呈現，本文無法完整還原平台後端演算法與布林邏輯設定，因此不主張研究結果具有可完全重複之檢索精確性，而是將其定位為網路輿情趨勢觀察與政策議題分析。

KEYPO 年度總聲量、情緒比例與熱門關鍵字僅作為趨勢性資料；各年度前 500 筆高互動樣本僅用於觀察平台分布、標題語彙與典型討論，不直接推論為全量母體。本文並於

表格註記中明確區分「年度總聲量」與「高互動樣本」，避免將樣本平台分布誤作全量平台趨勢。

情緒分類方面，本文承認 KEYPO 屬商業情緒分析系統，後端模型、訓練資料與分類規則未完全公開，且中文網路語境中的反諷、抱怨式正面語言與情緒混合語句，均可能影響分類效度。因此，本文不將 KEYPO 情緒比例視為精準心理測量，而是將其作為年度情緒方向的觀察指標；在詮釋「負面比例升高」時，並同時參照熱門關鍵字、年度代表性語意摘錄與官方結婚統計，以降低單一演算法分類造成的解釋偏誤。

質性分析方面，本文採取「關鍵字—語意脈絡—論述框架」三步驟：先從年度熱門關鍵字辨識經常出現的討論主題，再檢視高互動樣本中標題與可見文本所呈現的歸因邏輯，最後歸納為經濟壓力、婚姻風險與性別角色三類論述框架。由於本文未取得可公開再發布之完整原始留言，後文以匿名化語意摘錄呈現典型說法，作為質性錨定，而不冒充逐字原文。

四、資料倫理與研究限制

因本研究所使用之 KEYPO 資料係作者自系統匯出與整理之研究素材，而非官方民意調查資料，本文僅將其作為網路公共討論之觀測材料，不將其推論為全體臺灣民眾意見。另因 KEYPO 系統之平台收錄範圍、情緒分類演算法與去重規則未完全公開，本文於分析時採取趨勢性與詮釋性判讀，並以官方人口統計資料進行對照，以降低單一資料來源造成之解釋偏誤。

對於 2024 年熱門關鍵字中出現「比肩」、「情敵」等娛樂事件型詞彙，本文將其視為演藝人物新聞與社群事件帶動婚姻討論之現象，而不直接等同於低婚率的核心結構因素。此類詞彙可用來說明婚姻議題容易受到娛樂新聞、性別道德、親密關係信任與社群事件共同觸發，但本文在成因分析上仍以結婚率、晚婚、不婚、經濟壓力與性別角色等較穩定的議題詞為主。

本文的限制在於，第一，網路輿情資料不能直接代表全體民意；第二，平台演算法、新聞事件與社群爆文可能影響年度聲量；第三，本文主要使用年度總量與高互動樣本，尚未進行逐篇貼文的大規模語意標註；第四，情緒分析由系統分類提供，本文未能完全掌握其模型訓練與判準。為降低上述限制，本文採取三項補強：其一，以內政部戶政司結婚登

記、婚姻狀況與年齡結構資料作為外部對照；其二，將 KEYPO 情緒結果定位為方向性指標，而非因果推論證據；其三，以匿名化語意摘錄補強三類論述框架的文本基礎。

參、文獻檢閱與理論架構

一、低婚率與第二次人口轉型

第二次人口轉型理論指出，現代社會的人口行為不再只是受到工業化、都市化與經濟發展影響，也受到個人化、自我實現、性別平等、家庭型態多元化與生活價值轉變影響。晚婚、不婚、同居、低生育與家庭形式多樣化，皆可視為第二次人口轉型下的重要現象。Van de Kaa (1987) 與 Lesthaeghe (1995) 的研究提供理解現代婚育行為變遷的重要理論基礎；Jones (2007) 對東亞晚婚與低生育的討論，則有助於說明臺灣低婚率並非孤立現象，而是東亞社會共同面臨的家庭形成困難。

東亞比較研究亦顯示，臺灣、日本、南韓與新加坡等社會的低婚率與低生育率，往往同時受到長工時、青年就業不穩、住宅成本、教育競爭與性別分工制度延滯影響。Raymo 等人 (2015) 指出，東亞家庭制度雖持續重視婚姻與生育的連動，但女性教育與就業機會提升、婚姻市場條件改變與家庭照顧責任不均，使婚姻形成逐漸延後。此一比較視角有助於說明，臺灣低婚率並非單一國家或單一年齡層的偏差，而是東亞現代化過程中家庭制度調整不足的共同現象。

近年臺灣研究也逐漸將少子化問題前移至婚姻形成階段。袁詠蓁與孔祥明 (2022) 以臺灣適婚年齡者為研究對象，指出多數未婚者並非完全排斥婚姻，而是當下並無強烈結婚意願；女性較抗拒傳統婚姻價值與姻親關係壓力，男性則受到經濟能力期待影響而延遲進入婚姻。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 (2022) 亦指出，在臺灣非婚生育並不普遍的社會脈絡下，結婚與生育仍高度連動，因此少子化問題不宜只從「不生」來理解，而應進一步追問未婚者為何不願或不能進入婚姻。

駱明慶 (2007) 對臺灣總生育率下降的討論亦提醒，人口指標的下降不能只停留於表象解讀，而應進一步辨識婚育時程、家庭形成模式與社會制度條件之間的關係。放在本文脈絡中，低婚率不應只是被理解為「結婚對數下降」，而是婚姻作為人生必經階段的正當性逐漸鬆動。年輕世代不再必然將結婚視為人生完成的標準，而是將婚姻放入個人自由、生活品質、情感支持、經濟能力與未來風險之間重新衡量。

二、婚姻形成與生命歷程變遷

生命歷程理論強調，個人的教育、就業、離家、結婚、生育與退休等事件並非孤立發生，而是受到社會制度、年齡規範、家庭期待與歷史條件影響。婚姻不只是私人情感選擇，也是一個受到教育延長、就業市場、居住成本與家庭責任制約的人生轉折。Mayer 與 Tuma（1990）對生命歷程研究與事件史分析的整理，提供本文理解婚姻作為人生轉折事件的理論基礎。Liefbroer et al.（1994）也指出，結合行為會受到婚姻意向與生命歷程因素共同影響。

臺灣既有研究已注意到女性初婚率、初婚年齡、家庭生活歷程與婚姻行為變遷等問題。例如，王德睦與張國偉（2010）討論臺灣女性初婚率的量與步調；楊文山等人（2010）探討臺灣女性初婚年齡變遷；楊靜利與劉一龍（2002）從家庭生活歷程角度分析臺灣家庭形成變化；楊靜利等人（2006）則從婚配空間與婚姻行為變遷切入，說明傳統婚配模式在臺灣社會中的轉變。郭曉滢（2003）對臺灣晚婚現象的研究，亦可作為理解婚姻延後的早期臺灣經驗。

在本文中，生命歷程理論可用來說明，臺灣青年晚婚或不婚並不是單純延後某個人生事件，而是整個「標準人生路徑」正在改變。過去「畢業—就業—結婚—買房—生子」的線性人生模式，在高房價、低薪資、工作不穩定與照顧壓力增加之下逐漸失效。低婚率因此反映的是青年生命歷程制度安排的斷裂，也顯示傳統家庭形成模式已難以回應當代青年生活處境。

三、性別角色、婚姻態度與不婚選擇

低婚率的另一個重要面向，是性別角色與婚姻態度的變遷。McDonald（2000）的性別平等觀點指出，當女性在教育與職場中的地位提升，但家庭內部家務、育兒與照顧責任仍未平等分擔時，女性婚育意願可能下降。許碧純（2020）從東亞比較角度指出，臺灣、日本、南韓等東亞已開發國家面臨持續低生育問題，政府應更積極投入性別平等與支持家庭的友善政策，以避免陷入低度生育困境。Gibson-Davis（2009）則從家庭形成的財務期待角度提醒，經濟條件與婚姻決策具有密切關聯。

本文所稱性別平等權（Gender Equality），係指不同性別者在權利、資源、機會與保護上均享有平等待遇，不因性別而受到歧視或限制。此概念不僅涉及教育與職場機會，也

涉及家庭內部家務、育兒、照顧與情緒勞動是否能公平分擔。放在低婚率問題中，性別平等並非抽象價值宣示，而是影響婚姻吸引力與婚育意願的重要制度條件。

臺灣相關研究中，葉光輝等人（2012）對家庭價值觀變遷的分析，可用來說明臺灣家庭倫理與婚姻觀念的轉變；趙淑珠（2003）對未婚單身女性生活經驗與婚姻意義的反思，有助於理解女性如何重新評估婚姻；張祐慈（2009）對臺灣女性維持單身的社會學分析，也可支撐本文對不婚現象的社會結構解釋。近年謝儲鍵等人（2026）亦從晚婚族群的家庭價值與認知切入，指出女性教育與經濟獨立、青年自我價值重視及原生家庭經驗，都會影響其對婚姻的信任與期待。

須補充說明的是，謝儲鍵等人（2026）屬本文撰寫期間已公開可檢索之近年研究，本文引用目的在於呈現晚婚族群家庭價值與婚姻認知的最新討論，並不以該文作為本文 KEYPO 資料年份的直接證據。

四、網路輿情與公共政策觀察

過去低婚率研究多以人口統計、問卷調查或深度訪談為主，較少從網路公共討論角度觀察社會如何理解婚姻下降問題。隨著社群媒體、論壇、新聞留言與短影音平台成為公共討論的重要場域，婚姻議題不再只是私人生活經驗，而是在數位平台上被集體表達、爭論與重新定義。

網路輿情分析具有即時、大量、多元與可追蹤等特性，有助於掌握政策議題在數位公共場域中的形成、擴散與情緒變化；但其匿名性、代表性與資料可信度也需要被審慎處理。傅文成等人（2019）從大數據分析取徑討論傳統媒體與社群媒體的議題設定與預示效果，提醒研究者應關注新聞媒體與社群討論之間相互形塑的過程。國際計算社會科學研究亦提醒，社群媒體資料雖可呈現公共議題的即時反應，但必須注意平台使用者偏差、演算法排序、資料可取得性與文本情緒辨識的限制（Pak & Paroubek, 2010；Barberá et al., 2019）。

因此，本文使用 KEYPO 資料，並非將網路聲量視為全體民意，而是將其視為觀察議題熱度、情緒傾向與論述結構的材料。官方統計可以呈現結婚率下降的「結果」，而網路輿情則能揭示社會大眾如何理解這個結果、如何歸因，以及如何將低婚率與青年貧窮、高房價、性別分工、親密關係風險與少子化政策連結起來。

五、本文理論架構

本文以第二次人口轉型理論、生命歷程理論與性別平等觀點作為主要理論基礎。第二次人口轉型理論有助於說明，低婚率並非單純的人口數量變化，而是晚婚、不婚、同居、低生育與家庭型態多元化等現象共同構成的社會轉型。生命歷程理論則指出，婚姻作為人生重要轉折，受到教育延長、就業不穩、居住成本與社會年齡規範變遷的影響，因此低婚率可被視為青年生命歷程延後與標準人生路徑鬆動的結果。性別平等觀點進一步提醒，當女性在教育與職場中的自主性提高，但家庭內部家務、育兒與照顧責任仍未平等分擔時，婚姻便可能被視為高風險與高負擔的制度安排（Van de Kaa, 1987; Lesthaeghe, 1995; McDonald, 2000）。

基於上述理論，本文將低婚率理解為「結構壓力—婚姻態度—婚姻行為」之間的互動結果。經濟壓力、居住負擔、性別角色不平等與生活價值轉型，會影響青年對婚姻的風險感知與態度評估；而這些態度又透過晚婚、不婚、不婚不生等形式表現出來。本文在資料分析中將三組理論操作化為三個觀察面向：第二次人口轉型理論對應「不婚、不婚不生、個人自由、生活品質」等價值轉型語彙；生命歷程理論對應「晚婚、買房、就業、薪資、育兒成本」等人生時序與制度條件；性別平等觀點則對應「家務、育兒、照顧、婆媳、情緒勞動、經濟提供者壓力」等性別角色語彙。如此可使理論不只停留在文獻回顧，而能在後文資料分析中被檢驗、支持或修正。

肆、2023—2025 年婚姻輿情資料分析

一、官方統計：結婚對數與粗結婚率下降

表 1

臺灣 2023—2025 年結婚對數與粗結婚率

年度	結婚對數	粗結婚率	資料說明
2023 年	125,192 對	5.36‰	內政部戶政司，按登記日期統計
2024 年	123,061 對	約 5.30‰	內政部戶政司，按登記日期統計
2025 年	104,376 對	4.47‰	內政部戶政司，按登記日期統計

註：本文依內政部戶政司（2026a）資料整理。

從表 1 可見，臺灣結婚對數在 2023 年至 2025 年間呈現明顯下降。2023 年結婚對數為 125,192 對，2024 年微降至 123,061 對，2025 年進一步下降至 104,376 對。若以粗結婚率觀察，2023 年為 5.36‰，2025 年則下降至 4.47‰。這顯示臺灣婚姻形成能力正在弱化，也意味著少子化問題不應只停留在「生育意願不足」，更應追問青年為何不願或不能進入婚姻（內政部戶政司，2026a）。

官方統計提供了人口行為變化的結果，但無法直接呈現社會大眾如何理解低婚率，也難以揭示青年對婚姻的焦慮、期待與拒斥。因此，本文進一步使用 KEYPO 輿情資料，從網路公共討論觀察低婚率如何被社會歸因與論述化。

二、年度聲量分析：婚姻議題維持高位討論

表 2

2023—2025 年 KEYPO 婚姻輿情整體聲量

年度	婚姻輿情總聲量	年度變化	主要討論焦點
2023 年	161,819 筆	—	不婚不生、個人自由、老年孤獨、婚姻恐懼
2024 年	213,622 筆	較 2023 年上升	性別道德、婚姻信任、高房價、生活成本、不婚選擇
2025 年	197,673 筆	較 2024 年下降，仍高於 2023 年	晚婚、不婚不生、拒婚時代、性別期待與婚姻壓力

註：本文依作者提供之 KEYPO 婚姻輿情年度資料整理。

從表 2 可見，2023 年至 2025 年間，婚姻議題在網路公共討論中始終保持高聲量。2024 年聲量最高，達 213,622 筆，顯示婚姻議題不僅是人口問題，也涉及性別關係、情感信任、社會價值與經濟壓力。2025 年雖較 2024 年下降，但仍高於 2023 年，且討論焦點更集中於晚婚、不婚與不婚不生，代表低婚率已逐步成為被社會意識到的公共問題。

2023 年的討論較多圍繞「不婚不生是否老了會後悔」、「結婚生子是否仍是人生目標」等價值辯論。2024 年的討論則延伸至性別道德、婚姻信任與遺產安排等議題。2025 年的討論更直接將低婚率與晚婚、不婚不生、經濟壓力及性別期待連結，顯示低婚率的網路論述逐漸由生活選擇轉向結構壓力。

三、情緒傾向分析：負面情緒明顯升高

表 3

2023—2025 年 KEYPO 婚姻輿情情緒分布

年度	正面聲量	中立聲量	負面聲量	負面比例
2023 年	26,157 筆	78,099 筆	57,563 筆	35.57%
2024 年	36,621 筆	86,833 筆	90,168 筆	42.21%
2025 年	38,753 筆	43,596 筆	115,324 筆	58.34%

註：本文依作者提供之 KEYPO 婚姻輿情年度資料整理。

從表 3 可見，婚姻輿情中的負面比例逐年升高。2023 年負面比例為 35.57%，2024 年上升至 42.21%，2025 年更達 58.34%。這表示，婚姻議題在網路討論中已不只是「生活選擇」問題，而逐漸轉化為「焦慮議題」與「制度不信任議題」。負面情緒升高，反映社會大眾對婚姻所附帶的經濟負擔、情感風險、家庭責任與性別不平等感到不安。

2025 年負面情緒的擴大尤其值得重視。該年度負面評論集中於女性對婚姻的恐懼與拒絕、對情緒勞動與生育工具化的抗拒，以及男性對經濟壓力與婚姻負擔的疲憊感。這說明網路輿情中的「不婚」並不只是對家庭價值的否定，而是對婚姻制度中風險、責任與不平等安排的反應。

四、熱門關鍵字與議題結構分析

表 4

2023—2025 年 KEYPO 婚姻輿情熱門關鍵字與論述重點

年度	熱門關鍵字	論述重點	分析意義
2023 年	結婚率、不婚、結婚	討論不婚不生、老年孤獨、結婚是否仍為人生目標	婚姻議題仍以個人選擇與生活價值辯論為主
2024 年	比肩、情敵、結婚率	受娛樂人物、不婚選擇、性別道德與婚姻信任議題帶動	婚姻討論與性別觀感、親密關係信任及社群事件交織
2025 年	結婚率、晚婚、不婚	討論拒婚時代、晚婚、不婚不生、經濟壓力與性別期待	低婚率明顯被歸因為結構壓力與婚姻制度吸引力不足

註：本文依作者提供之 KEYPO 婚姻輿情年度資料整理。

2023 年 KEYPO 熱門關鍵字包括「結婚率、不婚、結婚」，顯示當年度討論仍以婚姻本身與不婚選擇為主。2025 年熱門關鍵字則為「結婚率、晚婚、不婚」，顯示議題已由單純討論是否結婚，轉向討論婚姻延後、婚姻意願下降與婚姻制度吸引力不足。

至於 2024 年出現「比肩」、「情敵」等詞彙，則反映該年度婚姻輿情受到演藝人物新聞與社群事件帶動，並不代表低婚率本身的核心結構因素。因此，本文在分析上將其視為事件型關鍵字，主要用以說明婚姻議題容易被娛樂新聞、性別道德與親密關係信任議題共同觸發。

從議題結構來看，「低婚率」在網路上常被放置於三種論述框架中。第一是經濟壓力框架，即將不婚、晚婚歸因於低薪、高房價、生活成本與育兒負擔。第二是性別不平等框架，即將婚姻疑慮歸因於家務、育兒、情緒勞動與照顧責任不均。第三是價值轉型框架，即將不婚視為個人自由、自我實現與生活品質追求的一種選擇。三種框架相互交織，使低婚率成為兼具人口、社會、性別與政策意義的複合議題。

表 5 整理年度高互動樣本中常見的匿名化語意摘錄。此處並非可識別之逐字原文，而是依標題與可見文本整理之典型說法，用以呈現網路討論如何將低婚率歸因於經濟壓力、婚姻風險與性別角色。

表 5
低婚率三類論述框架之匿名化語意摘錄

論述框架	匿名化語意摘錄	對應議題	分析意義
經濟壓力	「不是不想結婚，是連房租、房貸和生活費都壓得喘不過氣。」	高房價、低薪、生活成本	婚姻被理解為高成本決策，支持生命歷程理論對制度條件的重視。
經濟壓力	「沒有穩定收入，不敢把另一個人和小孩的人生一起背起來。」	就業不穩、育兒成本	晚婚或不婚呈現風險管理，而非單純反婚姻。
婚姻風險	「結婚不是童話，而是法律、財產、家人關係和責任的綁定。」	親密關係風險、財務風險	婚姻吸引力下降與制度信任不足有關。

論述框架	匿名化語意摘錄	對應議題	分析意義
婚姻風險	「一個人過得好，不一定要用婚姻證明人生完整。」	個人自由、生活品質	支持第二次人口轉型理論中的自我實現與家庭型態多元化。
性別角色	「婚後家務、照顧長輩和生育壓力多半還是落在女性身上。」	家務育兒、照顧責任	性別平等不足削弱女性進入婚姻的誘因。
性別角色	「男生被期待要有房有車能養家，沒有條件就乾脆不談結婚。」	男性經濟提供者壓力	傳統性別角色同時限制男女雙方的婚姻想像。

註：本文依作者提供之 KEYPO 資料整理。

五、平台分布與輿情擴散參考

表 6

2023—2025 年婚姻輿情高互動樣本平台分布（各年度前 500 筆）

年度	樣本筆數	前五大來源平台分布
2023 年	500	Facebook 163 筆（32.6%）；PTT 154 筆（30.8%）；YouTube 47 筆（9.4%）；Dcard 論壇 40 筆（8.0%）；FBG 27 筆（5.4%）
2024 年	500	Facebook 136 筆（27.2%）；PTT 109 筆（21.8%）；Dcard 論壇 67 筆（13.4%）；YouTube 55 筆（11.0%）；Threads 45 筆（9.0%）
2025 年	500	Threads 119 筆（23.8%）；Facebook 118 筆（23.6%）；Dcard 論壇 112 筆（22.4%）；YouTube 52 筆（10.4%）；PTT 51 筆（10.2%）

註：本表依作者提供之 2023、2024、2025 年婚姻輿情.xlsx 整理。此表為各年度 Excel 高互動樣本資料，不代表全量母體分布。

表 6 作為高互動樣本觀察，婚姻議題的代表性討論平台在三年間呈現變化。2023 年以 Facebook 與 PTT 為較高比例來源，2024 年 Facebook 與 PTT 仍占重要位置，但 Dcard、YouTube 與 Threads 的比例提高；2025 年則呈現 Threads、Facebook 與 Dcard 三平台並列的現象。此一變化說明，在高互動樣本中，低婚率討論已不再只集中於傳統論壇與臉書社

群，也逐漸出現在更即時、更碎片化的短文社群平台，使婚姻議題更容易被情緒化、故事化與標籤化。

六、資料分析小結

就第一項研究問題而言，2023 年至 2025 年婚姻輿情維持高聲量，且 2025 年負面情緒比例明顯升高，顯示婚姻議題已在網路公共場域中持續公共化。就第二項研究問題而言，熱門關鍵字與論述框架顯示，低婚率主要被歸因於經濟壓力、居住負擔、婚姻風險與性別角色不平等。就第三項研究問題而言，「不婚」、「晚婚」與「不婚不生」已不只是個人生活選擇，而逐漸成為青年世代重新評估婚姻制度的公共語言。

就低婚率成因而言，本文進一步歸納網路輿情形成三類主要框架：其一為經濟壓力框架，將不婚與晚婚歸因於高房價、低薪、生活成本與育兒負擔；其二為婚姻風險框架，將婚姻視為可能帶來財務、情感、家庭責任與親密關係不確定性的制度安排；其三為性別角色框架，強調女性對家務育兒責任不均的抗拒，以及男性對經濟提供者角色的壓力。這三類框架共同說明，低婚率並非單純個人價值選擇，而是結構壓力與婚姻制度風險共同作用的結果。

從「不婚」、「晚婚」與「不婚不生」三組語彙觀察，青年世代對婚姻制度的重新評估具有不同層次。「不婚」意味著婚姻不再被視為人生必經階段；「晚婚」反映青年將婚姻延後至經濟、職涯與居住條件較穩定之後；「不婚不生」則進一步挑戰婚姻與生育之間的傳統連動。由此可見，低婚率並非單純拒絕婚姻，而是青年在成本、風險、性別分工與自我實現之間重新衡量婚姻制度的結果。

綜合上述，低婚率不只是人口統計上的下降現象，也是在數位公共場域中被敘事化、情緒化與政策化的社會問題。這些資料並不代表全體民意，卻能呈現婚姻議題如何連結青年壓力、性別關係、家庭制度轉型與公共政策討論。

就理論回扣而言，本文資料大致支持第二次人口轉型理論對個人化、自我實現與家庭型態多元化的說明，因為「不婚」、「不婚不生」、「生活品質」等語彙確實反映婚姻不再被視為唯一正當人生路徑。然而，本文也修正第二次人口轉型理論在臺灣脈絡中的解釋：網路輿情所呈現的不婚與晚婚，並不只是價值個人化的結果，更受到高房價、低薪、育兒

成本與性別角色不平等制約。因此，臺灣低婚率同時包含價值轉型與結構壓力兩條路徑，不能僅以個人主義或家庭價值衰退概括。

伍、低婚率的社會意義與政策討論

一、低婚率已成為少子化之前的關鍵問題

官方統計與網路輿情呈現一致方向：臺灣結婚對數明顯下降，而網路上對不婚、晚婚與不婚不生的討論維持高熱度。這表示，少子化並非單獨發生於「生育階段」，而是更早出現在「婚姻形成階段」。若青年未進入婚姻，臺灣在既有家庭制度與生育文化下，要提升生育率將更加困難（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2022；內政部戶政司，2026a）。

此一發現可回扣第二次人口轉型理論。婚姻不再只是社會規範下必然發生的人生階段，而逐漸成為個人自由、生活品質與風險評估之間的選擇結果；網路輿情中「不婚」、「晚婚」、「不婚不生」的高頻討論，正反映家庭型態與婚育價值的多元化。因此，政策若只將少子化理解為育兒補助不足，容易忽略更前端的婚姻形成困難。

二、低婚率不是個人主義，而是結構壓力的結果

網路輿情顯示，低婚率常被討論為高房價、低薪、工作壓力、育兒成本與生活不確定性的結果。2023 年負面評論即指出，許多年輕人因高房價與低薪資而選擇不婚不生，並將之視為當前社會的普遍現象。2025 年討論則更進一步將經濟壓力、生活成本、婚姻價值觀轉變與性別角色負擔視為晚婚與不婚的重要成因。

這些討論顯示，不婚或晚婚並不必然代表青年拒絕親密關係，而可能是對現實壓力的風險管理。當結婚意味著房貸、育兒、照顧長輩、雙薪壓力與職涯中斷可能性時，婚姻便從「人生期待」轉化為「風險投資」。就理論回扣而言，這一發現可與生命歷程理論相互呼應：晚婚與不婚並非單一時間點上的個人態度，而是教育、就業、居住與照顧責任等生命歷程安排重組後的結果。

三、性別角色不平等削弱婚姻吸引力

從 2023 年至 2025 年的婚姻輿情可見，許多女性對婚姻的疑慮並非來自不相信愛情，而是擔心婚後承擔不對等的家務、育兒與情緒勞動。2025 年負面評論尤其集中於女性對婚姻的恐懼與拒絕，並指出女性不願成為免費服務者、生育工具或情感負擔承擔者。

男性方面，傳統「經濟提供者」角色也使部分男性承受較高婚姻壓力。2025 年資料指出，部分男性因經濟壓力與婚姻負擔而對戀愛與婚姻感到疲憊，甚至將時間與精力轉向健身、投資與個人興趣。因此，低婚率不是單一性別的問題，而是婚姻制度仍承載傳統性別角色期待所造成的雙重退卻（許碧純，2020；McDonald, 2000）。

此處亦可回應性別平等觀點：當女性在教育與職場中的自主性提高，但家庭內部照顧責任與情緒勞動仍未平等分擔時，婚姻便容易被視為高成本、高風險的制度安排。男性所承受的經濟提供者壓力，則顯示傳統性別角色同時限制男女雙方對婚姻的想像。因此，低婚率治理不能只訴諸道德勸說或婚育宣導，而應將性別平權落實為家庭政策、勞動政策與照顧政策的制度設計。

四、網路輿情將低婚率問題公共政策化

KEYPO 資料顯示，低婚率討論已不只是個人情感經驗，而是逐步連結到高房價、青年貧窮、性別平等、少子化與公共政策。2025 年資料指出，政府和企業已開始關注不婚與晚婚趨勢，試圖透過政策與措施回應低婚率與少子化挑戰。

這說明低婚率正在被「政策問題化」。當網路討論反覆將婚姻困難與青年經濟條件、住宅成本、家庭責任與性別不平等連結起來，低婚率便不再只是私人選擇，而成為公共治理問題。政策上，政府若只提供結婚補助或生育津貼，可能無法處理青年真正關心的婚姻風險與成家條件。

五、政策啟示

第一，低婚率治理應從「催婚」轉向「成家支持」。政策不宜只用結婚補助或生育津貼鼓勵青年結婚，而應改善青年進入婚姻前的生活條件，包括可負擔住宅、穩定薪資、友善職場與青年資產累積機制。

第二，少子化政策應前移至婚姻形成階段。若結婚率持續下降，生育率將難以單靠托育與育兒補貼改善。因此，人口政策應將低婚率納入少子化治理架構，從青年交往、成家、居住、就業與照顧支持等層面整體規劃。

第三，性別平等應進入家庭政策核心。若家庭內部家務、育兒與照顧責任仍高度不平等，女性即使在教育與職場中取得更多自主，也可能因婚姻風險而降低婚育意願。因此，政策應強化男性育嬰假使用、家庭照顧支持、職場彈性與家務平權倡議。

第四，政府可運用網路輿情作為政策觀測工具。KEYPO 資料雖不能直接代表全體民意，但可用於掌握議題熱度、情緒變化與社會焦慮來源。未來政府在設計人口政策、青年政策與家庭政策時，可將網路輿情分析作為輔助工具，與官方統計、問卷調查及深度訪談相互補充。

第五，應重新思考婚姻與生育的制度綁定。臺灣長期以婚姻作為生育與家庭形成的主要制度前提，但若低婚率趨勢持續，政策就需要同時處理婚姻支持與多元家庭支持。這並非否定婚姻制度，而是承認青年生活型態正在多元化，公共政策必須在尊重個人選擇的前提下，創造更穩定、更友善且更平等的成家環境。

陸、結論與建議

本文以 2023 年至 2025 年 KEYPO 婚姻輿情資料為基礎，並結合內政部戶政司官方統計，分析臺灣低婚率問題的網路論述與政策意涵。整體而言，本文發現低婚率不僅是年度結婚對數下降的統計現象，也反映於適婚年齡人口中未婚比重偏高，以及網路公共討論中對婚姻焦慮、制度不信任與風險感知的升高。

從趨勢觀察，臺灣結婚對數由 2023 年的 125,192 對下降至 2025 年的 104,376 對，粗結婚率亦降至 4.47‰；同時，114 年底 25 至 44 歲人口中未婚者約占 53.62%。KEYPO 資料亦顯示，2023 年至 2025 年婚姻議題維持高聲量，且負面比例由 2023 年的 35.57% 上升至 2025 年的 58.34%。此一結果雖不宜被解讀為全體民意，但可作為觀察數位公共場域中婚姻風險感知變化的重要指標。

就成因而言，網路輿情主要形成三類論述框架：其一為經濟壓力框架，強調高房價、低薪、生活成本與育兒負擔；其二為婚姻風險框架，強調財務、情感、法律與家庭責任的不確定性；其三為性別角色框架，強調家務育兒不均、女性照顧負擔與男性經濟提供者壓力。這些框架共同說明，臺灣低婚率並非單純來自個人主義或家庭價值衰退，而是價值轉型與結構壓力共同作用的結果。

在理論意義上，本文資料大致支持第二次人口轉型理論對個人化、自我實現與家庭型態多元化的說明，但也修正其在臺灣脈絡中的適用方式。臺灣低婚率不只是價值個人化的結果，更受到高房價、低薪、育兒成本與性別角色不平等制約；因此，生命歷程理論與性別平等觀點，有助於補足第二次人口轉型理論對東亞婚姻制度壓力的說明。

基於上述研究發現，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 一、少子化治理應前移至婚姻形成階段。政府不宜只以生育津貼或育兒補助回應人口危機，而應將青年交往、成家、居住、就業與照顧支持納入整體人口政策設計。
- 二、低婚率治理應從「催婚」轉向「成家支持」。政策應優先改善青年進入婚姻前的生活條件，包括可負擔住宅、薪資穩定、職涯安全與青年資產累積機制，使婚姻不再被視為高風險的經濟負擔。
- 三、性別平等應落實於家庭政策與勞動政策。若家務、育兒、照顧與情緒勞動仍由特定性別承擔，婚姻吸引力將持續下降；因此，政策應強化男性育嬰假使用、家庭照顧支持、友善職場與家務平權倡議。
- 四、政府可將網路輿情作為政策觀測工具。KEYPO 資料雖不能代表全體民意，但可協助掌握議題熱度、情緒變化與社會焦慮來源，未來可與官方統計、問卷調查與深度訪談相互補充。
- 五、應重新思考婚姻與生育的制度綁定。臺灣長期以婚姻作為生育與家庭形成的主要制度前提，但若低婚率趨勢持續，政策即須同時處理婚姻支持與多元家庭支持，在尊重個人選擇的前提下，創造更穩定、更友善且更平等的成家環境。

最後，本文仍有研究限制。KEYPO 資料具有平台代表性、演算法不透明與情緒分類不可完全複製等問題，因此本文將其定位為政策議題觀察與論述分析材料，而非可推論全體民意的調查資料。後續研究可進一步結合問卷調查、深度訪談、Google Trends、新聞資料庫與社群文本主題模型，以更精準檢驗不同世代、性別與階層對婚姻制度的態度差異。

總之，低婚率並非單一人口現象，而是臺灣社會結構壓力在親密關係與家庭形成上的集中表現。若婚姻被青年視為高成本、高責任與高不確定性的制度安排，則少子化治理必須回到青年能否安心成家、是否願意共同承擔照顧責任，以及社會制度能否提供平等而穩定的生活支持。

參考文獻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2022）。想婚或不婚？「家庭動態調查」中的未婚者圖像，3月29日。

<https://survey.sinica.edu.tw/epaper/20220329.html>

- 內政部戶政司（2026a）。結婚對數及粗結婚率：按登記日期統計。內政部戶政司人口統計資料庫。檢索日期 2026 年 5 月 19 日，取自 <https://www.ris.gov.tw/info-popudata/app/awFastDownload/file/y4s1-00000.xls/y4s1/00000/>
- 內政部戶政司（2026b）。現住人口數按性別、年齡、婚姻狀況及婚姻類型分：中華民國 114 年底。內政部戶政司人口統計資料庫。檢索日期 2026 年 7 月 10 日，取自 <https://www.ris.gov.tw/info-popudata/app/awFastDownload/file/y0s3-00000.ods/y0s3/00000/>
- 王德睦、張國偉（2010）。台灣女性初婚率的量與步調。**臺灣社會福利學刊**，8（2），29-66。
- 袁詠蓁、孔祥明（2022）。結婚不結婚：臺灣適婚年齡者進入婚姻與否的考量因素。**人口學刊**，64，1-49。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Article/Detail?DocID=10183841-202206-202209210003-202209210003-1-49>
- 郭曉滢（2003）。台灣社會晚婚現象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 張祐慈（2009）。她還不婚？台灣女性維持單身的社會學分析〔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研究所。
- 許碧純（2020）。東亞已開發國家的性別平等、家庭政策對生育之影響：對臺灣的啟示。**臺灣公共衛生雜誌**，39（2），129-142。
- 傅文成、謝奇任、邊明道（2019）。以大數據分析取徑探究傳統媒體與社群媒體的議題設定與預示效果：以洪仲丘事件為例。**傳播與社會學刊**，50，99-131。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Article/Detail/P20180326001-201910-201911070007-201911070007-99-131>
- 葉光輝、章英華、曹維純（2012）。臺灣地區民眾家庭價值觀之變遷與可能心理機制。載於伊慶春、章英華（編），**台灣的社會變遷，1985-2005：家庭與婚姻，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系列三之一**（頁 29-73）。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楊文山、張祐慈、范維君（2010）。台灣女性初婚年齡變遷的社會學初探〔論文發表〕。**2010 年臺灣人口學會年會暨人口變遷與社會發展學術研討會**，4 月 29-30 日，臺北：國立臺灣大學。
- 楊靜利、劉一龍（2002）。臺灣的家庭生活歷程。**臺灣社會學刊**，27，77-105。
- 楊靜利、李大政、陳寬政（2006）。台灣傳統婚配空間的變化與婚姻行為之變遷。**人口學刊**，33，1-32。

- 趙淑珠（2003）。未婚單身女性生活經驗之研究：婚姻意義的反思。《教育心理學報》，34，221-246。
- 駱明慶（2007）。台灣總生育率下降的表象與實際。《研究台灣》，3，37-60。
- 謝儲鍵、王光旭、高浩恩、陳揚中、詹慶恩（2026）。為何不願進入婚姻關係？初探晚婚族群之家庭價值與認知。《循證決策集刊》，4，56-67。https://ebp.ndc.gov.tw/
- Barberá, P., Casas, A., Nagler, J., Egan, P. J., Bonneau, R., Jost, J. T., & Tucker, J. A. (2019). Who leads? Who follows? Measuring issue attention and agenda setting by legislators and the mass public using social media dat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13(4), 883-901.
- Gibson-Davis, C. M. (2009). Money, marriage, and children: Testing the financial expectations and family formation theor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1(1), 146-161.
- Jones, G. W. (2007). Delayed marriage and very low fertility in Pacific Asi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3(3), 453-478.
- Lesthaeghe, R. (1995).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 interpretation. In K. O. Mason & A.-M. Jensen (Eds.), *Gender and family change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pp. 17-6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iefbroer, A. C., Gerritsen, L., & de Jong Gierveld, J. (1994). The influence of intentions and life course factors on union formation behavior of young adult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56(1), 193-203.
- Mayer, K. U., & Tuma, N. B. (1990). Life course research and event history analysis: An overview. In K. U. Mayer & N. B. Tuma (Eds.), *Event history analysis in life course studies* (pp. 1-20).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McDonald, P. (2000). Gender equity, social institutions and the future of fertility. *Journal of Population Research*, 17(1), 1-16.
- Pak, A., & Paroubek, P. (2010). Twitter as a corpus for sentiment analysis and opinion mining. *Proceedings of the Sev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anguage Resources and Evaluation* (LREC 2010).
- Raymo, J. M., Park, H., Xie, Y., & Yeung, W.-J. J. (2015). Marriage and family in East Asia: Continuity and chang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1, 471-492.
- Van de Kaa, D. J. (1987). Europe's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Population Bulletin*, 42(1).

An Analysis of Taiwan's Low Marriage Rat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A KEYPO Big Data Study, 2023–2025

Chia-Hsiang Hsu^{*}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aiwan's low marriage rate through the lens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Rather than treating low fertility solely as a problem of declining willingness to have children, this study argues that difficulties in marriage formation constitute a key antecedent to Taiwan's demographic crisis. Drawing on 2023–2025 KEYPO online public opinion data provided by the author and official marriage registration statistics from 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the article analyzes changes in discussion volume, sentiment, keywords, and issue frame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registered marriages declined from 125,192 couples in 2023 to 123,061 in 2024 and 104,376 in 2025, while the crude marriage rate fell from 5.36‰ to 4.47‰. Online opinion data show that marriage-related discussion remained highly visible across the three years, with 161,819 mentions in 2023, 213,622 in 2024, and 197,673 in 2025. Negative sentiment rose markedly, reaching 115,324 mentions, or 58.34%, in 2025. The analysis suggests that Taiwan's low marriage rate is not merely the result of individualism or a rejection of family values. It reflects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economic pressure, housing burdens, gender-role transformation, perceived marital risks, and changing life values. Policy responses should therefore move beyond birth incentives or marriage subsidies and focus on broader support for young adults, including housing affordability, wage security, family-friendly workplaces, care support, and gender equality.

Keywords: low marriage rate; delayed marriage; non-marriage; KEYPO big data; online public opinion

^{*} PhD student,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Mainland China Studies, The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Email: johnseen76@gmail.com
The paper was published under two double-blind reviews. Received: June 20, 2026. Accepted: July 20, 2026.